

從反動右派到史學宗師：雷海宗生前身後的起落*

黃相輔**

民國知識分子在1949年後的流離及命運是學界經久不衰的話題。留在中國大陸的學人中，雷海宗在史學界成名已早，擔任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歷史系主任，宣揚「文化形態史觀」，在民國時期眾多史學門派中獨樹一格。中共建政後，曾為國民黨員的雷海宗遭到嚴密政治監控及思想改造，調至南開大學，後來於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教研生活從此受嚴重打擊，直至身歿。1979年雷海宗的右派問題獲「改正」，其著作在昔日學生王敦書推動下重新整理出版，促成雷海宗研究的復興。南開大學並推崇雷海宗為該校世界史學科的奠基人。雷海宗生前身後學術名聲及地位的起落，是近現代中國政治浪潮變遷的縮影，也反映在不同形勢及需求下的歷史書寫，以及學術機構欲塑造集體記憶強化對自身歷史認同的努力。本文根據已知的現存材料，尤其是雷海宗門生故舊的回憶錄與南開大學保存的相關檔案，分析雷海宗生命中的關鍵節點：特別是在1949年前後及反右運動中的遭遇，以及其身後恢復學術名譽乃至被塑造為史學大師的經過。

* 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形塑傳記：歷史性與日常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年11月24至25日)。作者感謝江沛、汪正晟、徐兆安三位教授對初稿的評論，還有江沛、萬兆元教授在研究過程中協助查閱相關檔案及報紙材料。另外也要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寶貴的修訂建議。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通訊地址：中國天津市津南區海河教育園區同硯路38號。
通訊信箱：hsiang-fu.huang.10@ucl.ac.uk

關鍵詞：雷海宗、南開大學、反右運動、歷史書寫、集體記憶

一、引言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1949 年是生命軌跡劇變的一年。隨著國共內戰失敗，中華民國政府搖搖欲墜，共軍即將南下席捲大陸。在面臨政權更迭的當下，知識分子或走或留，成了人生抉擇的大問題，特別是那些與勝利者政見或意識形態不合的人。知名者如胡適(1891-1962)遠走美國；錢穆(1895-1990)赴香港；傅斯年(1896-1950)遷臺灣。也有人走到中途卻駐足遲疑，如陳寅恪(1890-1969)離平南下，最後停留在嶺南。更多的是乾脆不走而留下來的人。無論是基於何種原因走或留，民國知識分子在 1949 年後的去處及命運，向來是學術界或傳記文學經久不衰的話題。

雷海宗(1902-1962)是其中相對較少獲臺灣或海外學界關注的人物。雷海宗是民國初年史學界少見的留美博士，曾先後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及西南聯大歷史系主任，在學界可謂具聲望的一方領袖。但或許是由於雷海宗在政權鼎革之際沒離開大陸，後來又遭政治迫害，學術思想缺乏傳承，如今無論在港臺或海外皆少人聞問。雷海宗在 1957 年遭反右運動迫害，由於去世得早，倖免於後來的文化大革命，跟同時期其他學人如吳宓(1894-1978)及吳晗(1909-1969)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相比，又顯得不夠「慘烈」，少被後世傳記文學作者著墨。

雷海宗雖然在生前已獲摘除「右派分子」帽子，文革後並獲「改正」，但從反右到文革結束的二十餘年間，其親友保持沉默，也沒有雷的著作或相關研究刊行。直到 1980 年代，才開始陸續有研究雷海宗史學思想的文章發表，雷的著作也得以重印，象徵其學術名譽逐漸恢復。尤其是雷海宗生前最後任職的南開大學，積極推動雷海宗學術成就的復興。代表性的高峰是在 2002 年雷海宗百年誕辰、2012 年一百一十週年誕辰時，分別舉辦兩次紀念研討會，¹也趁機整理出版不少門生故舊對雷海宗的回憶及筆談，留下珍貴的

¹ 相關活動紀實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以下為徵引方便，分別簡稱《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

研究材料。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奉雷海宗為世界史學科的奠基人，為雷海宗製作雕像，與鄭天挺(1899-1981)的雕像一同並立於學院大廳(見附圖)。

雷海宗生前身後的起伏，反映中國近現代政治情勢及學術環境的變遷，不但是大時代下的一宗個案，如王汎森所謂「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²也為從事學術史及傳記研究者帶來值得思考的問題。就筆者所知，中外文學界尚未見雷海宗的傳記專著；雷的弟子王敦書所撰介紹雷海宗生平的文章，³以及相關紀念文集內的年譜簡編，⁴是目前能較完整略窺雷海宗生平的傳記作品。本文雖然以雷海宗生平敘事為線索發展，但並不是一篇雷海宗的生活或思想傳記。本文旨在藉由爬梳相關傳記材料，探討雷海宗人生中重要階段的轉折，以及他人如何影響其身後生命故事的塑造，乃至建立南開世界史一代「宗師」的地位。

從生前遭排斥的右派分子，到身後重獲學術名譽，再度成為值得被記憶的先驅，雷海宗的遭遇提供吾人得以思索歷史書寫如何打造歷史記憶。歷史記憶或記憶史在近年來已成為學界熱門的議題。正如法國歷史學者皮耶·諾哈(Pierre Nora)提出的概念「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émoire)所指涉，集體記憶的塑造及維繫有賴於一些有形或無形的「地方」來凝聚記憶所在，這些「地方」不一定指地理上的空間或場所，如自然名勝及古蹟，也可以是國旗、君王及《民法典》之類的國家象徵，或是歌謠、諺語、食物及節日等文化遺產，甚至是保存歷史事實並再造記憶的博物館、檔案與紀念碑等歷史編纂學作用之處。諾哈原本旨在解構形塑法國人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的種種代表法國的事物，揭示不同時代的人如何「因為當時的需求來為這些事物注入新的意

² 王汎森原引句是指傅斯年，見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³ 例如王敦書，〈《西洋文化史綱要》導讀〉，收入雷海宗著，王敦書整理、導讀，《西洋文化史綱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導讀頁1-5。

⁴ 例如馬瑞潔、江沛，〈雷海宗年譜簡編〉，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頁694-708。

義」。⁵相關概念也能延伸使用在國族之外的場域，像是本文所要聚焦的，學術機構或學人群體如何溯源「記憶」自身的歷史。近年關於雷海宗的紀念及立於學院大廳的雕像，正是一種學院欲重塑其光榮傳統的「記憶所繫之處」。選擇何人為值得被記憶的光榮傳統，當然牽涉到價值的判斷甚至史學寫作者個人的認同。有別於蘭克史學主張的那種純粹固定的客觀歷史，學界愈來愈關注歷史書寫的主觀性：史家體現的集體記憶往往是多重的，受到個人的文化或社會認同、在政治群體中的責任等諸多因素影響，選擇性地去遺忘或是記憶傳述，不同的記憶共存甚至彼此競爭。⁶以雷海宗的案例而言，下文將討論其弟子王敦書在復興其學術名譽扮演的關鍵角色，以及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追認此地位的意義。

由於雷海宗的個人日記、書信及手稿未保存，現存且開放閱覽的檔案紀錄也不多，可靠的傳記材料有限。目前已知的材料大致可分成四種：(1)已出版的雷海宗著作，包括後人整理的講義或課堂筆記；(2)親屬、門生與故舊的口述資料或回憶錄；(3)南開大學留存的雷海宗檔案，包括自白、各種身家調查、黨委報告等；⁷(4)反右運動期間發行的批判資料及報刊新聞報導。本文主要採用雷海宗的親友、學生及反右鬥爭當事人的回憶紀錄，並參考「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材料。特別是後者並未公開，臺灣或海外研究者不易查閱，對於重建雷海宗在中共建政後的遭遇是珍貴的一手資料。這些材料也有助釐清一些關於雷海宗生平的疑問，例如為什麼 1949 年他不走？還有留下之後，他的政治與宗教背景如何影響其處境？

⁵ Pierre Nora,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Volume 1: The State*, eds. Pierre Nora and David Jordan, trans. Richard Holbroo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xx. 另參見戴麗娟，〈譯者導言〉，收入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社，2012)，頁11-13。

⁶ Ann Rigney, "Introduction: Values, Responsibilities, History," in *Historians and Social Values*, eds. Joep Leerssen and Ann Rigne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7-8.

⁷ 筆者感謝江沛教授協助提供此檔案資料影本。由於原件未有編號，以下徵引時除加上文件標題及日期外，一律稱《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

要注意的是，以上材料除了雷海宗本人的著作及自白，都不易藉此窺得其內心思想。就算是自白，在當時的政治處境下，也難說有幾分是真心話。因此吾人對雷海宗的認識，特別是 1949 年後的雷海宗，能仰賴的幾乎都是從他者的視角來看雷海宗——無論是親友的溫情追思還是政敵的揭發批判。既然需依賴他者的敘事來拼湊雷海宗的生活，則敘事者立場、動機和資訊是否可靠，研究者自然須警惕。在本文中，回憶雷海宗的有其親人、學生、同事、後輩，還有相關事件牽涉的黨政機關幹部。他們的回憶都是在紀念雷海宗的背景下所寫作，難說沒有為逝者諱的做法，或突顯雷海宗在逆境中仍孜孜不倦於學術與教育的一面。另一方面，政治調查檔案與揭發材料對雷海宗的觀察則落入另一種極端，經常是惡意的負面意見。這些檔案和回憶錄反映的「歷史事實」呈現的是在特定時代脈絡下的歷史書寫：1950 年代反右運動中「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雷海宗，以及在冤案獲「改正」的 1990 年代後，擁有「偉大人格」的世界史學科奠基人雷海宗。

最後要指出，對雷海宗的學思與政治生涯的探討也有史學史上的意義。在 20 世紀上半受過西方完整訓練的中國史學家中，雷海宗是偏向綜論大趨勢、不著重「問題式研究」的代表人物。⁸雷海宗治史的風格與方法，與以胡適及傅斯年為代表的新史家有很大差異，體現民國時期史學流派的複雜與多元性。然而學界向來較少關注雷海宗的史學研究，或者僅著重雷海宗宣揚的「文化形態史觀」及抗戰時期參與「戰國策」學派的活動。近年來開始有學者以較宏觀的中國本土世界史學科建構的視角，探討雷海宗對 1930 至 1940 年代民族主義影響下的世界史論述發展的重要角色。⁹雷海宗的史學必須置入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短暫和平、戰爭陰影卻始終籠罩的時代脈絡去理解，和當時國際情勢及其個人對民族文化前途的現實關懷脫離不了關係。本文重點雖然不是闡釋雷海宗的史學思想，但是從傳記材料來看，亦期望還原其史學實踐在歷史中的面貌，能更「客觀」或至少公平地評價雷海宗。筆者認為在史

⁸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20），頁270-271。特別是頁271註3。

⁹ 例如Xin Fan, *World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65-83.

學史方面，傅斯年可作為雷海宗的對照：兩人的治史理念針鋒相對，今日在各自生前所屬的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皆被奉為奠基人，然而成為「宗師」的境遇卻大不同。本文結論將特別舉傅斯年和雷海宗加以對比。

二、1949 年以前：從論史到論政

雷海宗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出生於直隸省(今河北省)永清縣，父親雷鳴夏為基督教中華聖公會牧師，家中並有「中農成分」的土地，因此雷海宗日後自述成長於「小資產階級經濟成分」的家庭。¹⁰由於父親的職業，雷海宗在傳統蒙學之外也受宗教教育，17 歲以前在教會興辦的小學及中學就讀。雖然不清楚雷海宗日後是否信教，但可以確定教會對其教育栽培出力甚深。據其妻張景蒨(1901-1994)回憶，由於雷海宗的學業成績優異，教會以「供給不受限制」的豐厚津貼資助他完成大學學業。¹¹雷海宗於 1919 年插班轉入清華學校，並於 1922 年畢業，獲得公費赴美留學資格。儘管教會待遇不薄，雷海宗的家境依舊不很寬裕，尤其是父親在他留學期間去世，一時家中經濟陷入困難。身為長子的雷海宗承擔起仍在學的兩位弟弟、兩位妹妹的生計。返國任教後仍然持續供給弟妹，每月一半薪資都拿去接濟家裡，即便婚後亦然，故經濟負擔頗重。

清華畢業後，雷海宗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歷史研究所深造，主修歷史，副修哲學，並於 1927 年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研究 18 世紀法國政治家及經濟學家杜爾閣(Turgot)的政治思想。雷海宗甫畢業旋即返國，並於同年 8 月獲聘入南京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即後來的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系任教。年僅 25 歲就取得美國博士學位，入國立大學當教授，看起來似乎少年得志，然而雷海宗剛回國的處境並非完全一帆風順。據曾修過其西洋史課程

¹⁰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約1955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1。另參見馬瑞潔、江沛，〈雷海宗年譜簡編〉，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頁694。

¹¹ 張景蒨，〈我的回憶〉，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33。

的蔣孟引回憶，系上「有些冬烘先生妒火中燒」，批評雷海宗中國史學問不夠、中文不好。雷因此憤而大寫中國史文章，甚至講授中國史，以行動回擊質疑。¹²從這件軼聞也可略窺雷海宗的脾氣，以及他從歐洲近代思想史跨足到中國史研究的動機之一。其後數年，除了中央大學，雷海宗並輾轉任教於金陵女子大學、武漢大學，最終於 1932 年獲聘為清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雷海宗回母校清華任教，主要是得力於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1895-1965)的賞識。據多年後清華歷史系校友許亞芬回憶在美與蔣廷黻的談話，蔣廷黻稱就是由於看出雷海宗「有創見」，才延攬他來清華。¹³這話固然不虛，但或許也與兩人的經歷和志趣相投有關。蔣廷黻的求學背景和雷海宗極為相似——兩人少時都受教會學校栽培，並赴美留學取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皆關於西方政治史，且回國後皆轉向中國史研究。¹⁴蔣廷黻在赴美前就受洗為基督徒，從大學預科開始就讀，在美居留的時間更長。蔣廷黻自從 1929 年獲聘為清華歷史系主任起，就不斷思考如何改造歷史系為符合現代學術標準的教育機構，並且獎勵能回答中國現實問題或做通史性描述的研究人才。為此他不惜「放棄」一批舊學者，引進年輕新人來開設新課程、建立新方法。¹⁵顯然雷海宗廣泛而敢創新的治學方式能滿足蔣廷黻的目標。

雷海宗在清華期間持續發展他對中外古代史比較研究的興趣。眾所周知，雷海宗以宣揚德國學者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文化形態史觀」而聞名。文化形態史觀將人類文化視同有機生命體般擁有生老病死的表現，認為不同區域族群的文化也會歷經從發生、成熟到衰弱的規律。而且不同區域的文化平行發展，彼此不相干涉，也無從互相比較優劣或先進。這與時下流行以達爾文生物演化論、史賓賽社會文化進化論(sociocultural evolution)等學說為基礎的進化史觀，即人類文明從野蠻到開化不同階段「單一線性」

¹² 蔣孟引，〈雷海宗先生給我的教益〉，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113-114。

¹³ 許亞芬，〈紀念雷海宗師〉，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117。

¹⁴ 蔣廷黻的博士論文是論英國工黨的國內外政策。見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104-105。

¹⁵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頁165-166。1930年代之清華歷史學系，另參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65-71。

發展的看法相左。¹⁶其實雷海宗在1936年發表論文〈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前，¹⁷並未公開明確談及文化形態史觀，不過從他在1930年代前期開設的課程來看，當時已經對史賓格勒的著作產生興趣，開始醞釀文化形態學的思考了。另一方面，他也延續稍早在南京時開始的中國史研究，經常發表中國古代史相關的文章或評論。雷海宗的治史風格很有「通史」的綜合特色，常在一篇文章內就從春秋戰國連貫敘述至漢末三國以下。¹⁸這使得他的中國史研究常招來過於簡略及考據不足的批評，也不乏同仁明譏暗諷。例如，據何炳棣回憶，1937年在清華時就曾聽聞陳寅恪在雷海宗也出席的公開場合高聲諷刺：「何以目前居然有人會開中國上古史這門課？」（雷海宗當時教中國通史、中國上古史與秦漢史）。翁同文也在西南聯大的談話會中，聽見吳晗表示對雷的譏彈之意。¹⁹雷海宗則在文章中意有所指批評中國學界多年來「有意無意間受了實驗主義的影響」，把問題看得「太機械，太簡單」，表達對「認繁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積為歷史的人」的不滿。²⁰雷海宗喜好用歷史哲學去綜合，以文化形態史觀架構去做中外比較研究的史學路徑，跟以胡適與傅斯年等人為代表的歷史考證學派不合，不乏各種檯面上下的較勁。

¹⁶ 關於史賓格勒與文化形態史觀，見陳惠芬，〈文化形態史觀與國史研究：論雷海宗的史學〉，《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16期（臺北，1988.06），頁255-284；江沛，〈戰國策學派文化形態學理論述評——以雷海宗林同濟思想為主的分析〉，《南開學報》，第4期（天津，2006.07），頁37-43；John Farrenkopf, *Prophet of Decline: Spengler on World History and Politic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關於達爾文演化論、社會文化進化論與進化史觀的關係，見Peter Bowler,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284-292, 297-307.

¹⁷ 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頁167-186，原載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2卷第1期（北平，1936.10），頁1-33。

¹⁸ 例如在清華期間發表的〈中國的兵〉即可看出這種特色。見雷海宗，〈中國的兵〉，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頁97-127。原載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第1卷第1期（北平，1935.10），頁1-47。

¹⁹ 何炳棣，〈雷海宗先師專憶〉，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42-43。另見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112-113。

²⁰ 雷海宗，〈歷史警覺性的時限〉，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頁245。原載《戰國策》，第11期（昆明，1940.09），頁2-5。原文末有一編者按更明白指出：「雷先生本篇對於史學的解釋是根據他整個的歷史觀出發的。考證訓詁並不就是歷史學……他這兩點主張一方面是對當代『學究式』的史家當頭一棒……」。

抗日戰爭的爆發改變了雷海宗的生涯。平津失陷後，雷海宗隨學校遷到大後方，並擔任新成立的西南聯大歷史學系主任。雷海宗最大的改變是比以前更熱衷於時論寫作，1937年後在報刊上發表時事評論文章的數量明顯增加，尤其常為《中央日報》、昆明《民國日報》與《當代評論》撰稿。1940年，雷海宗與林同濟(1906-1980)、陳銓(1905-1969)、賀麟(1902-1992)等人在昆明創辦《戰國策》雜誌，認為當時世界大戰的局勢有如中國古代的戰國時代，提倡與研討「戰國時代之『大政治』」，倡導政治現實主義、尚力思想等文化改造主張，以圖國家民族之自存自強，時人稱之為「戰國策」學派。²¹戰國策派由於成員多親近德國思想及文化，加上挑戰中共宣傳抗日統一戰線的「民主」論述，引起多位中共黨員撰文批判戰國策派為法西斯主義。後世研究者認為上述衝突影響戰國策派學人在中共建政後遭整肅的命運。²²此時期雷海宗常發表基於文化形態史觀談古論今的文章，題材常圍繞國際情勢、軍武戰略與中西歷史文化比較。雖然《戰國策》雜誌維持的時間不長，雷海宗還與重慶《大公報》合作開設《戰國》副刊，撰寫一系列專題宣揚文化形態學及歷史週期的觀點。

雷海宗的論政受到國民政府注意及延攬，於1943年1月正式加入國民黨。據雷海宗大約於1955年向南開大學交代的個人思想自傳，他加入國民黨是經由姚從吾(1894-1970)及王信忠介紹。姚、王二人於1942年底攜帶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1893-1963)的信，邀雷海宗入黨。他考慮了幾天後，由於「愛國情緒」及「積極擁護抗戰」等種種原因答應。²³其實雷海宗入黨前，原本就與執政當局走得很近，像是為國民黨機關報撰稿、參加區黨部座談或為三民主義青年團講演。由他自抗戰以來積極入世論政的表現，也不能排除早有效法蔣廷黻從政的理想，正如在自白中承認入黨「也有濃厚的提高

²¹ 〈本刊啟事(代發刊詞)〉，《戰國策》，第2期(昆明，1940.04)，頁1。另參見范珮芝，〈抗戰時期的救亡思想：戰國策派的文化改造主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²² 施純純，〈戰爭與民主：抗戰時期中共的民主論述及戰國策派的挑戰〉，《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卷第3期(臺北，2020.09)，頁411-449。

²³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約1955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3。

自己地位的想法」。雷海宗於 1944 年擔任國民黨西南聯大區黨部執行委員，但翌年區黨部終止後，就未再任其他黨職或公職。隨著戰後復員北返，由於清華大學事務繁忙，就「很久沒有政治活動」。²⁴

然而在國共內戰塵埃落定前一年，雷海宗仍接受黨部請託力挽狂瀾的最後任務，即創辦並主編《周論》雜誌。1948 年受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吳禱人(1902-1984)之託，加上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1889-1962)勸說，雷海宗同意主持《周論》並撰寫每期社論。作為時政雜誌，《周論》雖由國民黨人士支持成立，但不是國民黨機關刊物，也不走激情宣傳路線，而是「承認政治興趣的正當與必需……無論是談政治，或談人生的其他方面，希望都能採取科學的方法，保有客觀的態度，維持冷靜的精神。」²⁵獲得包括胡適在內的眾多北大、清華教授撰稿，有不少專業性較強的文章。《周論》也隱然旨在以冷靜言論導引輿論，反對中共煽風點火的學運，並「表面上中立」實際上刊載親美反蘇、支持國民黨政府的言論。因此雷海宗日後在自白中說，這是他「與革命對立」的「解放前夕死硬反動思想的最後掙扎」。²⁶

為什麼雷海宗在政權易幟前夕不走？這恐怕是沒有肯定解答的懸案。1948 年末平津即將陷落之際，蔣介石實施「搶救學人計畫」疏導北平學人南下，雷海宗也屢次被列入名單中。無論是 12 月 11 日陳雪屏致電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12 月 16 日傅斯年與陳雪屏聯名致電平津鐵路局局長石志仁、12 月 17 日蔣介石致電傅作義，在這三封電文中，雷海宗皆名列該疏散南移的學人之列，而且是屬於「因政治關係必須離平者」這一類。²⁷可見其國民黨員身分，加以前反蘇反共的言論，更遑論出身自基督教牧師家庭的背景，在中共統治下確實有風險。然而雷海宗並未把握機會南下。

²⁴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約 1955 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 4。

²⁵ 〈發刊詞〉，《周論》，創刊號(北平，1948.01)，頁 1。

²⁶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約 1955 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 4-5。

²⁷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第 4 卷，頁 1103-1105；「蔣中正電傅作義」，〈武裝叛國(一七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197-213。另參見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7 期(臺北，2010.03)，頁 51。

其實 1948 年 12 月中旬時，共軍雖尚未入北平城，已經抵達近郊的清華園。根據「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內一份 1950 年匿名的揭發材料，可能來自清華學生，聲稱：「解放來得太突然了，以至於他〔雷海宗〕沒有來得及跑。剛解放時，我們去看他，雷師母說：『誰想到會這樣快，走也沒法子走了。』」學生問雷海宗的打算，雷還答覆「寒假中將有可能離開」。²⁸由此材料看來，雷海宗當時並沒有決定其動向。錢穆回憶在 1949 年鼎革之際四處尋訪學友，探詢去留意向，然而訪問多人皆未打算離開大陸。錢穆推測這是因距抗戰流亡不久，顧慮家人生計，知識分子大多觀望，「對共黨新政權都抱『與人為善』之心」。²⁹有些人則由於熱愛中國文化，不願遠去異國或殖民地，如吳宓就多次推辭來自美國及香港的講學邀請，並稱「快到解放時，宓自己決定：不問禍福如何，我決定不到外國去」。³⁰同樣為國民黨員的戰國策派學人賀麟，則由於對蔣介石失望，加上自認沒幹壞事，「共產黨也還需要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主動選擇留下。³¹或許以上解釋也能適用雷海宗的心情；尤其是近年來後人的紀念文章，常強調雷海宗的「愛國」情操，下文將再討論。無論是來不及走、暫且觀望猶豫不走，還是愛國而主動不走，總之雷海宗與家人就留在北平了。

1949 年 1 月中共軍管會接管清華大學。早已於前一年 11 月停刊的《周論》，也遭軍管會判定為「應予沒收」。雷海宗在自白中提到，他在「解放」後感到「茫然」，面臨的是全然陌生的新事物、新名詞和天翻地覆的世界，包括來自「群眾」的批判意見。³²據清華學生的揭發材料，雷海宗起初還是「像過去那樣看不起別人，自高自大，不太學習」，上課仍舊講原本那套文化形態史觀及歷史循環論，引起學生不滿，共產黨員學生並在課堂上質問雷

²⁸ 〈雷海宗小傳(材料來源文委會)〉(1950年11月)，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²⁹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266-267。

³⁰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頁127-128。需留意的是，此句引自吳宓於文革中所寫交代材料，因此是否能實際反映當時的想法，不無疑問。

³¹ 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頁41-42。

³²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約1955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5。

海宗，指控他宣傳反動思想，雷受此刺激才「放下了自高自大的架子」。此後雷海宗雖然盡量出席各種政治學習活動，但有次學生通知他去開會時，仍回答：「你們叫我開會，我要準備功課，到底怎樣好呢？」³³由這些紀錄可見，雷海宗在政權更迭之初不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對政治學習活動的態度僅是勉強應付。然而在群眾壓力日增下，雷海宗也感到難以應對，於1949年9月辭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職務，仍任歷史系教授。

三、風暴前的和平(1950-1956)

中共建政後，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雷海宗也投入連串思想改造工作，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由於雷海宗曾為國民黨員，於1950年起被列為管制對象，翌年才獲撤銷管制。他於1950年春季參加北京近郊的土地改革運動，1951年又隨中共統戰部組織北大、清華教授「西北土地改革參觀團」赴陝西長安縣。這兩次參加土改的經驗對他震撼頗深，尤其是在西北一個月考察期間，目睹激烈的群眾動員及階級鬥爭，自認在思想上、感情上「捲入農民對地主鬥爭的怒潮中」，至此才「感到自己也是千千萬萬人民的一分子」。³⁴雷海宗在這段期間於《光明日報》發表多篇參加土改的心得報告，亦有文章被選錄進做為知識分子及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參加土改學習樣板的文集《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³⁵同時為了檢討幼年的宗教教育背景，亦在這年於《大公報》、《光明日報》與《歷史教學》等報刊發表一系列批判天主教教會的文

³³ 〈雷海宗小傳(材料來源文委會)〉(1950年11月)，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³⁴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約1955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6。

³⁵ 雷海宗，〈參加土改總結與一年學習總結〉，《光明日報》(北京)，1950年3月29日、3月30日，2版；雷海宗，〈社會科學工作者與新的社會科學——參觀土地改革中的一個體驗〉，《光明日報》(北京)，1951年4月4日、4月5日，2版，收入吳景超、楊人楩、雷海宗等著，《光明日報》編輯所編，《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報社，1951)，頁19-29；雷海宗，〈參觀西北土地改革中額外的一大收穫——西安市人民生產教養院參觀後感〉，《光明日報》(北京)，1951年6月2日、6月3日，2版。

章，並將稿費全捐獻國家。³⁶可見在新政權統治下的頭幾年，為了擺脫政治與宗教身分上的「原罪」，雷海宗只能努力「贖罪」揮別自己的過去。

然而，綜觀 1950 年代初期雷海宗發表的各種土改或思想改造相關文章，措辭相對較溫和，沒有點名批鬥特定「戰犯」或「階級敵人」，多著墨自我省思與內心變化，缺少同類文章常有的戾氣。我們無從得知雷海宗是不願還是無法熟練此類作文；無論何種情況，皆可暗示他還不適應新政權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文化，套句俗話形容即是「思想覺悟不夠徹底」，僅為應付政治學習要求而表態。以被收錄於《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的文章〈社會科學工作者與新的社會科學——參觀土地改革中的一個體驗〉為例，其中雖然有讚揚人民群眾智慧與共產黨土改幹部的部分，也隨俗引用毛主席話語，但主旨並非就土改的階級鬥爭意義發揮，而是長篇泛論社會科學改造的必要性，顯得絮叨且學究氣十足。與之成對比的是一同赴西北考察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景超(1901-1968)：吳景超的土改心得也被選入《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但文字精練許多，簡潔有力地表達土改對其思想和心情的積極影響，文末並將土改「奇蹟」歸功於毛主席的領導與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宣示將「更踴躍的投入人民的隊伍，與人民齊一步伐，在毛澤東偉大的旗幟之下，為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而奮鬥。」³⁷吳景超的作文無疑更加積極明確。毛澤東(1893-1976)閱讀《光明日報》載吳文後也讚賞「寫得很好」，囑令《人民日報》轉載，並令新華社廣播各地。³⁸吳景超曾在國民政府長期擔任行政院參事、秘書等職，深諳官場生存之道。他雖然沒加入國民黨，但從政十餘年，又和胡適交

³⁶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約1955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6。在報刊發表的文章例如：雷海宗，〈從歷史事實看天主教〉，《光明日報》(北京)，1951年4月17日，3版；雷海宗，〈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一)——今日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簡介〉，《歷史教學》，1951年第8期(天津，1951.08)，頁49-51；雷海宗，〈近代史上的羅馬教——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之二〉，《歷史教學》，第9期(天津，1951.09)，頁75-78。耐人尋味的是，雷海宗批判的是羅馬天主教，而非其父信仰及自幼受教育的基督新教，此一細節或許可說明他不願違心與過去決裂。

³⁷ 吳景超，〈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收入吳景超、楊人樞、雷海宗等著，《光明日報》編輯所編，《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報社，1951)，頁32-33。

³⁸ 〈毛澤東致胡喬木(1951年3月29日)〉，轉引自〈毛澤東書信中關於吳景超的內容摘錄〉，收入呂文浩、嚴飛、周忱主編，《把中國問題放在心中：吳景超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22)，頁413。

好並參與《獨立評論》社，加上其專業社會學在中共建政後淪為極度「政治不正確」的學科，政治處境之危殆不下雷海宗，迫使他必需緊急徹底地順應時代變化。吳景超後來公開批判胡適、梁漱溟(1893-1988)，³⁹文字之堅決激烈，也可視為與過去劃清界線的自保作法。研究吳景超的學者呂文浩認為，吳在1949年後言論劇烈的改變都是知識分子的「違心之舉」。⁴⁰相較之下，雷海宗的文筆不慍不火，也更專注學術而不是政治性寫作。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歷史系被撤銷，雷海宗被調到南開大學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南開意外地成為他餘生的歸宿。關於被迫離開清華，雷海宗並未透露心情或感想，僅有其學生王敦書回憶(或許是私下聽聞的)，雷海宗知道自己將調往南開時，對清華園的鄰居張岱年(1909-2004)說：二十五年留學回國時，南開曾發聘書給他，當時未能成行，現在終於要去了。王敦書認為雷海宗的心情是「四分感慨，三分無奈，三分自嘲」。⁴¹根據一些師生的回憶，由於雷海宗的學術聲望，南開大學對他待遇不錯，生活上盡量給予照顧，教學工作上也尊重及重用。⁴²

然而，從雷海宗調入南開後的檔案及任職期間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來看，這種和平無疑是如履薄冰。在南開大學1952年的簡歷及政治態度紀錄中，雷海宗的家庭成分一欄登記為「宗教職業者」，也說明其參加國民黨的反動背景，總結評語是「在歷史界很有名，過去思想反動，思想改造運動中，因檢查澈底，曾做過典型報告。思想有顯著轉變。」⁴³而1953年安排雷海宗任

³⁹ 吳景超，〈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收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彙編》(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第3輯，頁107-111；吳景超，〈批判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收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梁漱溟思想批判：論文彙編》(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第1輯，頁11-29。

⁴⁰ 楊芳，〈吳景超：被浪費的才情〉，《中國青年報》(北京)，2008年5月7日，版次不詳。

⁴¹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頁24。

⁴²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24；魏宏運，〈憶雷海宗先生在南開的歲月〉，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頁9-10；辜燮高，〈雷海宗先生南開教學軼事〉，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頁11。

⁴³ 〈簡歷與政治態度〉(1952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人事表格內，中共南開大學總支委員會評估意見亦指出雷海宗「學識淵博，但觀念有些不正確」，中共天津市學校黨委會的批示則是「材料不全，暫不作鑑定」，在「政治上可靠程度／有無政治問題？」一欄則空白。⁴⁴特別是其中一筆政治態度紀錄，記載 1953 年 3 月，當蘇聯領袖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去世的消息正在廣播時，「他與鄭天挺在辦公室內不知為什麼事哈哈大笑」，且之後「實無悲痛表現，仍談笑自若」。⁴⁵這些材料說明雷海宗在南開初期，中共組織對其政治評價仍曖昧不明，留下日後鬥爭的伏筆及材料。雷海宗的自白也紀錄他調到南開後仍不停參加各種政治學習，包括 1954 年 9 月起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夜大學修習一學年「中國革命史」課程，參加「胡風反革命集團資料」的學習，以及在肅反運動進行時響應校方召開的多次「坦白檢舉」。⁴⁶

據同時在南開任教的辜燮高(1923-2021)回憶，雷海宗初到南開的三年(1952-1955)間，世界史教研室基本上處於放空城狀態，經常開課的只有雷海宗和他。其他教師不是另有外派任務，去黨校學習或編中學教科書，就是還未到職履新。雷海宗主要講授世界古代史及世界現代史課程。辜燮高當時年輕資淺，講授世界中古史，在雷海宗建議下嘗試擺脫西方中心論，但南開圖書館十分缺乏西方以外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的資料，有賴雷海宗口述補充，他筆記後再在課堂上講述。⁴⁷因此這門課實際上是由雷海宗在背後籌畫。雷海宗對年輕後進的照顧不僅這一例。從燕京大學調來的林樹惠，原定講授世界近代史，但由於口才欠佳，原本專業也非世界史，講課不受學生歡迎，只好由雷海宗上場代教，並安排林隨班聽課。林樹惠因此對雷海宗十分感佩，後來在反右運動期間不願批判雷海宗，發言表示「雷海宗是我最好

⁴⁴ 〈安排雷海宗進南開大學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表格〉(1953年4月2日，封面有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1957年10月21日印)，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4。

⁴⁵ 〈安排雷海宗進南開大學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表格〉(1953年4月2日，封面有中共天津市委統戰部1957年10月21日印)，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頁6。

⁴⁶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約1955年)，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頁10-11。

⁴⁷ 辜燮高，〈雷海宗先生南開教學軼事〉，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頁11。

的老師」。⁴⁸魏宏運(1925-2021)也指出，1953年雷海宗在家裡為他和幾位歷史系的青年教師私下開課，講授西周和秦漢史。⁴⁹不少1950年代在南開聽過雷海宗講課的學生皆對其教學內容和演說風采有好評。⁵⁰以上事例可見雷海宗對教學的熱忱，以及1950年代前期對南開世界史教學從無到有的建設。

在這段相對和平的歲月中，雷海宗也重拾一些學術研究。首先是自1953年起擔任《歷史教學》雜誌的編委，並撰寫多篇世界上古史的文章。當然，他原本秉持的文化形態學及歷史週期已不能再提了，現在得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教學及立論。然而雷海宗也擷取唯物史觀來調整其史學研究，某種程度延續他以文化形態來比較物質文明推演的治史思路。例如由於開設「物質文明史」課程，以古代中亞至黑海北岸活動的塞其提人(Scythian，或譯斯基泰人、西徐亞人)的袴、馬褂、長靴、風帽等服裝的演進來討論物質技術對文明的影響，雷海宗開始對上古時代歐亞大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及服裝史感興趣，於1956年發表〈上古中晚期亞歐大草原的游牧世界與土著世界〉，這是他在1949年後開創的少數學術研究成果之一。⁵¹

這段期間，雷海宗也收了幾位研究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其人生最後階段隨侍身旁的王敦書。

四、反右遇禍

王敦書早在1951年考入清華歷史系本科時就初識雷海宗。他的父親和雷海宗其實彼此認識，是相差一年的清華學堂同學。由於這層關係，王敦書

⁴⁸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24-25；張景蕪，〈我的回憶〉，頁32。

⁴⁹ 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36。

⁵⁰ 例如張象，〈憶雷海宗先生與世界現代史學科〉，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84-87；馮爾康，〈重溫與新習伯倫師的學術宏論〉，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90-91；陳振江，〈深情憶雷師〉，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97-100。

⁵¹ 原本為世界上古史講義的最後一章，後專門發表於《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版)1956年第1期。見雷海宗著、王敦書整理，《世界上古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2)，前言頁4、頁358-390。雷海宗講授物質文明史的課堂經驗，見馮爾康，〈重溫與新習伯倫師的學術宏論〉，頁91；陳振江，〈深情憶雷師〉，頁98-99。

考進清華前就已仰慕這位父親口中的史學大家「雷年伯」。後來雷調到南開，兩人暫時失去聯繫。直到 1956 年，雷海宗開始招收世界上古中古史專業副博士研究生，王敦書在雷的鼓勵下回天津報考並錄取，於 1957 年 2 月向南開報到，⁵²沒想到就成為雷海宗的關門弟子，也不覺一場風暴正在前方醞釀等待兩人。

1957 年春季的「大鳴大放」鼓勵黨外知識分子提出批評意見以助整頓中共黨內，然而黨外人士的反應熱烈超出當局預料，中共高層擔心情勢失控會削弱中共統治基礎，甚至導致如前一年匈牙利十月事件般的反共抗爭。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標誌著中共態度的驟然轉變，大鳴大放變成中共「引蛇出洞」劃分並打擊右派分子的「陽謀」。反右運動打擊的對象，很快地擴大到其他民主黨派、學界、文藝界、新聞出版界，甚至包括中共黨內人士。⁵³各種反右的小冊子及批判資料也在 1957 年中以後如雨後春筍般發行，例如中國科學院所屬的科學出版社輯錄郭沫若(1892-1978)等學界領導在近期會議的發言，號召「為捍衛我們國家指導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戰鬥，為捍衛社會主義事業而戰鬥」，幫助讀者進一步「識破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陰謀……展開反右派的鬥爭」。⁵⁴

雷海宗於 1957 年 8 月 14 日被劃為「右派分子」成為反右鬥爭的對象。關於雷海宗如何被捲入反右運動的始末，呂萬和、馮承柏(1933-2007)、王敦

⁵²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23-25。

⁵³ 關於反右運動的研究論著，例如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658-696；李福鐘，〈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至1958年中共政局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7期(臺北，2007.05)，頁43-98；錢理群，〈拒絕遺忘：「一九五七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裴毅然，〈這是為什麼？：「右」難及成因〉(臺北：獨立作家，2022)。

⁵⁴ 科學出版社編輯部，〈前言〉，收入科學出版社編，〈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第1輯，無頁碼。

書及魏宏運的回憶是目前為止最詳細的紀錄。⁵⁵這四位當事人以不同的角色親歷這場事件。呂萬和是馮承柏的上司，時任中共天津市委文教科部科學處長，是在天津市層級執行指令及起草文書報告的基層主管。馮承柏為中共天津市委文教科部幹事，負責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組織工作，協助呂萬和彙整資料。魏宏運是南開歷史系講師，同時也兼中共南開大學委員會委員、歷史系黨總支書記，負責歷史系教師的反右工作。⁵⁶以上三人雖然非決策者，但參與天津或北京的相關會議及執行工作，在回憶中透露許多內部談話或傳達等珍貴的第一手材料。王敦書僅是剛入學不久的研究生，甚至非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不知內幕過程，其對雷海宗事件的描述多是以第三者立場的事後調查。但王敦書親歷南開校內的批判大會，提供事件當下對雷海宗處境的近距離觀察。

雷海宗事件的其他史料，還包括「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保存的部分零散表格、報告及揭發材料，還有事件後稍晚才出版的公開批判資料，例如中共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教授孫定國(1910-1964)撰的《雷海宗批判》與科學出版社蒐集編纂反右文章的《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三輯。⁵⁷這兩本批判資料皆於1958年才出版。整體來說，事後出版的批判資料常是過去公開言論或文章的輯錄，對編纂雷海宗人生傳記幫助有限，儘管它們可代表反右語境下雷海宗的「罪狀」及鬥爭的公開理由。研究者仍需以當事人的回憶為墊腳石，搭配檔案材料互相參照，才能釐清事件經過。

據馮承柏等人指出，雷海宗是由於三個事件成為反右鬥爭的目標。首先是1957年4月時，雷海宗在天津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中評論馬克思主義社會

⁵⁵ 馮承柏，〈史學大師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難始末〉，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76-83；呂萬和，〈百家爭鳴中的我與雷海宗——兼談「唯心」、「唯物」及「批判」〉，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頁51-57；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26-30；魏宏運，〈憶雷海宗先生在南開的歲月〉，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頁10。

⁵⁶ 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頁38-41。

⁵⁷ 孫定國，《雷海宗批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科學出版社編，《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第3輯。

科學及歷史學的發展，認為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之後雖然於革命理論方面取得成果，但許多社會科學觀點仍停滯在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去世時。這番發言卻被《人民日報》記者濃縮扭曲成批評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停留在 1895 年」(即恩格斯去世那年)。《人民日報》並在報導後加按語表示反對，引發各界議論。鄭天挺之子鄭克晟(1931-2022)回憶當時在北京看到《人民日報》報導，頓時一驚，生怕禍從口出，連自己父親也要倒楣。⁵⁸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譚天榮隨後來津「煽風點火」，訪問雷海宗，並撰文替雷遭《人民日報》「殘害」抱不平，使雷海宗的處境更加尷尬。最後是雷海宗正好在此刻發表論文〈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⁵⁹其中認為奴隸社會不是人類史上普遍的社會形態及歷史階段的觀點，被後來的批判資料普遍引用為雷海宗顛覆馬列主義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罪狀。⁶⁰南開大學於 6 月時展開校內第一波反右鬥爭，雷海宗在大會上澄清譚天榮的訪問，揭穿譚天榮的「不學無術」，並當眾嚴正宣示擁護中共及馬克思主義，駁斥所謂取消黨的領導的言論。這番正確的表現使他得以全身而退，暫時未被劃為右派。⁶¹據魏宏運稱，這也是由於雷海宗學術聲望高，天津市委不願動他。⁶²鄭克晟記載約 6 月 29 日晚與其父一同在雷宅吃飯，剛好是雷海宗在校內大會上慷慨發言表態後不久，飯後鄭天挺談話似有安慰雷這次應無事之意，雷海宗卻臉色無表情「未置可否」，恐怕仍對自己的命運感到忐忑不安。⁶³

⁵⁸ 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北京：中華書局，2023)，頁258。

⁵⁹ 雷海宗，〈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歷史教學》，第7期(天津，1957.07)，頁41-47。

⁶⁰ 例如孫定國，〈揭穿雷海宗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惡毒手法〉，收入科學出版社編，《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3輯，頁95-100；吳廷璆，〈駁斥雷海宗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謬論〉，收入科學出版社編，《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3輯，頁110-111。

⁶¹ 〈南大學生擊退右派反動言論〉，《天津日報》(天津)，1957年6月28日，版次不詳；馮承柏，〈史學大師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難始末〉，頁80-81；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26。

⁶² 魏宏運，〈憶雷海宗先生在南開的歲月〉，頁10。

⁶³ 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頁258。

呂萬和的回憶提供更多高層決策內幕，顯示在是否批判雷海宗的問題上，中共中央與天津市的態度是不同調的。據呂萬和指出，相較於北京學界及中共中央積極批判雷海宗，天津市委顯得消極，不但不滿《人民日報》報導擅加按語，也認為雷海宗論世界上古史分期及奴隸社會的觀點是學術問題，並非政治問題。然而在7月初，呂萬和赴北京參加「全國科技學術界反右鬥爭大會」，聽到翦伯贊(1898-1968)、郭沫若在大會上點名批評雷海宗，就已感覺風向不對勁，請託友人拿到康生(1898-1975)在中共中央的內部報告紀錄，看完後警覺「不能不批雷海宗」了。但呂萬和返回天津報告後，天津市委領導仍舉棋不定，不願表態。從呂萬和「不點，怕犯錯誤。點了，怎麼批判？」的形容，就能看出天津市委基層幹部的左右為難。最終呂萬和把雷海宗加入批判名單內，但括註問號，將草案交由天津市委文教科長梁寒冰(1909-1989)批示。8月初，梁寒冰自北京開會返回，傳達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1906-1996)的指示，非批判雷海宗不可。據呂萬和轉述，梁寒冰在會中遭陸定一和康生當面嚴厲指責，說天津市委不批雷海宗就犯了「右傾」，要求天津市高校重新召開反右鬥爭。⁶⁴文教科只好向天津市委呈送檢討，承認錯誤，隨即在8月中旬暑假期間召集學生返校，南開歷史學系、校方與天津市不同單位緊急召開多場批判會議，雷海宗就此被打成右派。

當時人人自危的氛圍，可以從四位當事人的遭遇看出：馮承柏與呂萬和分別由於「支持」及「組織」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罪名受雷案牽連，馮被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遭開除黨籍，呂則成為天津市委獲處分最重的「極右分子」之一。兩人所屬的文教科科學處亦隨之撤銷。據馮承柏表示，負責處理此事的一位領導幹部曾說：當時如果呂萬和不當右派，自己就得當右派；自己當了右派，呂萬和也得當右派，於是只好讓呂去當。⁶⁵馮與呂二人明顯成為天津市委上級為了平息中共中央怒火的代罪羔羊。王敦書、魏宏運在事後也遭牽連。王敦書認為就是由於在批判大會中不願發言批評其導師，導致

⁶⁴ 呂萬和，〈百家爭鳴中的我與雷海宗——兼談「唯心」、「唯物」及「批判」〉，頁52-54。馮承柏及王敦書的回憶也有提到類似傳聞，說康生批評為什麼天津不批判雷海宗，「認為馬克思主義1895年後就不發展了，這還不夠定右派？」。

⁶⁵ 馮承柏，〈史學大師雷海宗先生1957年蒙難始末〉，頁82。

翌年自己也被補劃為右派。⁶⁶魏宏運則由於包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雷海宗的罪名，在稍後的「拔白旗」運動中被批判為右傾、「走白專道路」，文革中亦遭造反派算舊賬批鬥。⁶⁷

馮承柏與魏宏運皆指出，是由於天津市委扛不住中央的壓力，才使原本逃過首波反右鬥爭的雷海宗被補劃為右派；雷海宗在7月以前面對質疑的反應，說明他是「堅決擁護共產黨」的。呂萬和更明確認為是康生直接造成雷案悲劇。然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雷海宗被列為反右鬥爭對象，在8月中旬正式確定前早就成案了。最明顯的證據，是1957年7月6日天津市委整風辦公室的一份絕密文件〈右派分子情況登記表〉。其中洋洋灑灑整理雷海宗的表現及各種反動言論，包括前面提到的史達林事件，並指出雷在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時，「表面是謹言慎行，態度曖昧……雷胎中有鬼，對肅反運動是懼怕的」。最後對雷海宗政治態度分析的總結：

……1952年和1956年排隊時，以「其工作尚稱積極，熱情幫助年輕助教，在落後人物中很有代表性」劃為中間分子。現在看來，這個排隊本身就有矛盾，他既然在落後人物中很有代表性，又何謂中間分子。雷在解放後之所以不敢公開散布反動言論是與我們對其管制有關的。以其思想與一貫表現的實質來看是仇視我黨，不滿社會主義的。因此劃為右派(右派中的一般分子)為宜。⁶⁸

此份表格雖然未蓋章批示，結論和處理意見一欄也空白，卻能顯示當天津市委在7月初仍猶豫如何處置時，儘管仍支持雷海宗，也預先整理好資料，以備不時之需。中共組織的人事及政治檔案經常累積各種負面材料，作為有朝一日鬥爭時可用的「相罵本」，如趙儷生(1917-2007)批評的「光懂得記人家

⁶⁶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27。

⁶⁷ 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頁42、45、67-69。

⁶⁸ 中共天津市委整風辦公室製，〈右派分子情況登記表〉(1957年7月6日)，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的『壞事』，好事全不著錄」。⁶⁹以前述的史達林事件為例，鄭天挺和雷海宗一同在辦公室內高聲談笑，同樣被抓到辮子，但在反右鬥爭中雷海宗出了事，鄭天挺卻無事，固然由於鄭當時的政治地位較高(時任天津市人民代表，曾列席全國政協會議)，處境較安全，也不見得就能高枕無憂。鄭克晟回憶指出，8月底他在中國科學院歷史所食堂遇某位同事問：「雷已經右派了，你父親說錯話沒有？」當時無言以對，心中異常反感同事的無禮。10月上旬史學界開會批判雷海宗等右派分子，鄭克晟出席，「心中多希望老先生〔即父親〕能來」，直到見鄭天挺與南開歷史系其他領導一齊出現才放心，「心想此一運動總算躲過去了」。⁷⁰知識分子之危懼可見一斑。躲得過一時，不保證躲得過一世，鄭天挺日後仍遭批鬥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文革期間入「牛棚」嘗盡苦頭。

王敦書猜測，雷海宗之所以在反右鬥爭初期沒有立刻被批判，除了其學術地位，加上其有政治問題的言論具學術性，批判上要慎重。雷對於譚天榮事件的回應又正確，「站在黨和人民一邊」，所以黨領導一時沒有動他。⁷¹換句話說，非不能動，而是不好輕舉妄動。從檔案資料與馮承柏、呂萬和的證詞來看，王敦書的判斷可說是合理的。

被劃為右派的噩耗對雷海宗打擊很大，健康也急遽惡化。據張景蕓回憶，雷海宗被劃為右派分子當天，回家進門時彎著腰向他道歉，次日便血兩馬桶，臥床病倒，「從此無人敢進我們家門」。⁷²雷海宗被劃為右派後，遭全面停止教學工作、降職降薪，並多次在批判大會上公開受批鬥。例如1958年入學的本科新生尚黎即回憶，學校的「階級教育」便是安排新生旁聽批判

⁶⁹ 趙儷生，《籬槿堂自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88。趙儷生的另一件軼事亦透露中共組織人事檔案的特性：民國時期中共在華北進行土改時，趙曾將批評「農民就是真理」的想法寫進書稿，出版社告知付印途中運送書稿的船在渤海「遭蔣匪砲艇的襲擊」沉沒而未印行。後來在文革時，趙卻驚見有大字報揭發他這一「侮蔑農民沒有真理」的往事。他私下詢問當時所在單位的總支書記，才知「什麼遇見蔣匪砲艇，全是鬼話」，那份書稿就收藏在其檔案中。造反派進入檔案庫，他這件隱密自然就「曝光在群眾面前」。見趙儷生，《籬槿堂自敘》，頁118。

⁷⁰ 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聞湖：鄭克晟師友雜憶》，頁259。

⁷¹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27。

⁷² 張景蕓，〈我的回憶〉，頁33。

大會，由教師及高年級生輪流發言批判雷海宗，最後雷海宗做自我批判。⁷³除了在公眾場合上臺受批，平時還需提交各種反省檢討。⁷⁴雷海宗直到1961年10月才獲准「摘掉右派帽子」。南開大學黨委對其「摘帽」的報告，指出雷海宗被劃為右派後態度老實，主動向組織匯報交代二十餘次，也主動要求工作，參與一些翻譯校對的差事。報告還提到1958年香港某機關曾寄來一法文信，內容大致是如雷赴港，願保證其工作和生活。雷接信後隨即向領導報告，並上繳信件。這些事例證明雷海宗這幾年來「基本上心服口服，對自己的罪行尚能表示低頭認罪」。⁷⁵雷海宗後來獲准於1962年春重回教室講課。重回講壇不到一年，就由於長年來腎臟炎導致的尿毒症，於1962年12月25日病逝。

五、身後：恢復名譽及塑造大師

王敦書是雷海宗身後學術思想重新發揚並恢復名譽的關鍵推手。雷海宗被批判後，身為其學生的王敦書不敢再去雷家或與雷海宗交談，更於1958年2月也被劃為右派，遭取消研究生資格並下放農場勞動，暫時失去與雷的聯繫。直到1960年10月王敦書「摘帽」後，才獲准重返南開歷史系擔任資料員，在雷海宗生命的最後兩年協助處理編譯、教學工作及照顧生活起居。雷海宗過世時，王敦書也在場，並協助辦理喪葬事宜。由於這層情誼，葬禮辦完後，張景荊收王敦書為義子。⁷⁶

文化大革命期間，南開大學和其他高校一樣陷入混亂，雷海宗和鄭天挺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舊賬被重提，歷史系有人張貼「雷海宗陰魂不散」的大字報，王敦書嚇得回家立即焚毀留存的雷海宗著作與手稿，並撕去雷海宗

⁷³ 肖黎，〈最後的一課——記聲如洪鐘的雷海宗先生〉，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頁110。

⁷⁴ 例如雷海宗，〈公開檢討〉（1957年11月13日），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雷海宗，〈思想反省小結〉（1958年9月6日），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⁷⁵ 中共南開大學委員會，〈中共南開大學委員會關於對右派分子雷海宗的摘帽問題的報告〉（1961年9月22日），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⁷⁶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27-30。

贈書上有其印章與簽名手跡的扉頁。張景蕓在文革前已搬去北京投靠女兒及女婿，與王敦書也斷了音信。文革結束後，王與師母重新取得聯繫，得知雷家保存的雷海宗遺稿、日記乃至照片也在抄家時為自保而全數焚毀。⁷⁷後世研究者已無從接觸這些一手材料，自然是一大損失。

1979年，雷海宗和王敦書的「右派分子」問題皆獲得「改正」。在中共官方的語境中，雷等人是被「錯劃」成右派分子。官方定調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只是執行時「嚴重擴大化」，錯劃了不該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⁷⁸某種意義上，所謂的錯劃右派分子從未獲得真正的平反。

留在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的王敦書，自1980年代開始整理雷海宗的著作及倖存資料，並發表研究雷海宗史學思想的文章。在王敦書推動下，雷海宗的舊作重新發行，生前尚未發表或完成的課堂講義或舊稿也陸續出版，例如武漢大學圖書館收藏1931年雷海宗在武漢大學講授歐洲通史的鉛印提綱本，以及1950年代以唯物史觀編寫，卻由於反右而無法付梓的《世界上古史講義》。⁷⁹除了王敦書，海外學界也有雷海宗昔日的學生關注其史學研究，例如何炳棣就十分推崇雷海宗，赴美後仍與雷保持通信，並早自1973年即撰文為雷在中國上古史領域被世人忽略的成就辯護。⁸⁰對雷海宗的研究興趣在2002年其百年誕辰後達到高峰。據「中國知網」資料庫統計，單以關鍵詞「雷海宗」搜索得到的176條結果，發表在2000年(含)以前者僅有22篇；2001至2010年間有80篇，其中光2003年(即雷海宗百年誕辰的隔年)就占了17篇；2011年以後有74篇。⁸¹

南開大學是促成這波雷海宗史學「復興」熱潮的主要機構。當年院系調整時被調到南開的鄭天挺和雷海宗，二位在當時皆已是學界名家，如今也分

⁷⁷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頁30。關於南開大學在文革期間的動亂，參見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頁57-79。

⁷⁸ 中共官方對反右運動的定調，例如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北京)，1981年7月1日，1版。

⁷⁹ 雷海宗著，王敦書整理，《世界上古史講義》；雷海宗著，王敦書整理導讀，《西洋文化史綱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⁸⁰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頁117-118。

⁸¹ 中國知網，<https://cnki.net>，檢索日期：2022年10月30日。

別被尊為南開中國史及世界史學科的奠基人。本文一開始提到，新改組的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在 2002 及 2012 年分別舉辦雷海宗紀念研討會，⁸²趁機徵集史料，輯錄出版相關人物的訪談或回憶錄。這些文獻亦成為本文重要的史料來源。2019 年南開大學迎接百年校慶，作為「南開百年史學名家文庫」系列之一，南開大學出版社也出版《雷海宗文集》，整理雷海宗在 1949 年前發表的學術及政論文章。⁸³除了南開，雷海宗曾服務二十載的北京清華大學也有紀念措施，例如在其校友總會「百年清華」網站上轉載文章介紹這位老校友，⁸⁴甚至 2023 年也在人文學院大廳立雷海宗雕像——不過不單雷海宗，還並列鼎鼎有名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及趙元任，以及民國時期曾在清華任教的吳宓、吳晗、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及蔣廷黻等人。清華校史上值得頌揚的學術名人繁多，雷海宗還不是主角，僅是躬逢其盛的群星之一。至於在臺灣復校的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中央大學，在兩岸分途的現實環境下，對於雷海宗就徹底遺忘了。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尊奉雷海宗、鄭天挺為學科奠基人，成為具獨特地位的「記憶所繫之處」，似乎理所當然，畢竟兩人同時在 1952 年調來南開，分別擔任世界史及中國史教研室主任(鄭天挺並兼歷史系主任)，兩人資歷和聲望相當，從抗戰前北平學界、西南聯大到南開，生命軌跡多處重合，於公於私皆有交情。然而仔細分析，這個選擇並非那麼理所當然。南開歷史學科的歷史遠比 1952 年更源遠流長：1919 年建校之初就設有歷史學門；1921 年梁啟超來校主講後來內容出版為《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文化史講座；1923 年正式成立歷史系。若以歷史系正式成立為起點，無論是中國史或外國史領域，第一位系主任蔣廷黻都是實質的創辦者。⁸⁵因此梁啟超、蔣廷黻，甚至和蔣同時僅短暫任教一年的李濟(1896-1979)，皆被列於學院的「名人牆」。但這

⁸²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於 2000 年成立，合併原有的歷史系、歷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及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⁸³ 江沛編，《雷海宗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

⁸⁴ 例如謝志浩，〈雷海宗：清華史學的「失蹤者」〉，<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952/16650.htm>，檢索日期：2022 年 10 月 30 日。

⁸⁵ 南開當初聘蔣廷黻來教西洋史；眾所周知，蔣在南開期間也致力編纂中國外交史資料文獻，提倡中國近代史研究。見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頁 114。

些民國學者皆不適合被高舉為南開史學宗師——梁啟超太有名，和南開交集又短，搶不過清華；蔣廷黻在兩岸分治後仍代表中華民國駐美及聯合國，要高調宣傳恐怕尷尬。1952年院系調整前即已在歷史系的其他教師，論輩分或名氣，皆不如後到的鄭天挺及雷海宗。選擇尊奉鄭、雷二人，某種意義上既突顯「新中國」治下1952年院系調整後新生的南開歷史系，賡續北大、清華的名家傳統，也同時肯定孕育兩位學者成名的民國學風。

事實上，雖然同樣曾遭批鬥，鄭天挺的學術生涯及政治待遇始終較雷海宗更好，不但活到文革之後，晚年任南開大學副校長，當選全國人民大會代表、天津市政協副主席，並在去世前一年以82歲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對鄭天挺的紀念因此發展得更早，在其逝世週年(1982)、九十冥誕(1989)，南開大學及天津市等單位皆有舉辦追思會，1999年百年誕辰時亦舉辦紀念研討會。⁸⁶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鄭天挺雕像，也是在百年誕辰時由校友王成彬製作並捐贈，⁸⁷但當時歷史系仍位於八里台校區，與其他單位共用樓層，空間狹小，此尊雕像因此一直存於倉庫而未永久公開展示。相較之下，雷海宗雕像製作得非常晚，在兩次紀念研討會後，才匯集校友捐款於2017年製作。其時歷史學院已遷至新建的津南校區，擁有獨立大樓，便將雷海宗雕像同鄭天挺雕像置於新落成的學院大廳。⁸⁸將鄭、雷雕像比肩並立的安排明顯有平衡學院所屬中國史、世界史學科的用意。可是從紀念活動乃至確立宗師地位的先後次序來看，實在還是以鄭天挺更為優先。

從近年來恢復雷海宗學術名譽及地位的過程，可知塑造一位宗師，主觀及客觀條件皆需具備。客觀上，大師需要有足以「經典化」的學術著作傳世，最好在世時即因其著作享譽學林；主觀上，則需現實中的學術機構認同、傳承並發揚大師的遺緒。雷海宗在民國時期已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文化形態史觀》等著作成名。雖然其原本的學思路徑在毛澤東時代無法持續，幸好在南開校內外仍有弟子王敦書、何炳棣等人推動恩師舊作的發行或研

⁸⁶ 鄭嗣仁，〈鄭天挺教授大事記〉，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384-385。

⁸⁷ 王成彬，〈鄭天挺雕像落成小記〉，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395。

⁸⁸ 筆者訪談江沛教授。江沛於2014至2020年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

究，不至於遭徹底遺忘。而在主觀條件方面，尚需要系(院)方領導幹部的支持方能成事，如魏宏運雖在反右運動時「不得不批判」雷海宗，仍尊敬其人格及學識，文革後長期擔任歷史系主任(王敦書同時為副系主任)，⁸⁹對雷海宗紀念活動亦多所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系(院)內也絕非意見一致，不乏對近年來「雷海宗走紅」現象的異議，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喬治忠便曾撰文嚴厲批評雷海宗名過其實，對吹捧雷的風潮不以為然。⁹⁰喬治忠稱雷海宗的史學論點與方法「舛誤充斥」、「乏善可陳」，並針對其文化形態史觀的粗陋謬誤及歷史考證方面的缺失加以批評。這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民國時期陳寅恪、吳晗等人早已據此輕視雷海宗的中國史研究了。喬治忠基於史料考據需嚴謹的標準，就事論事檢視雷海宗著作的錯誤，而不是如毛澤東時代以「極左」的意識形態來批評雷海宗這一「階級敵人」，已可謂是時代的進步。筆者肯定喬教授的文章對雷海宗走紅現象的省思，但以為其對雷海宗史學的批評有些過於苛刻，忽略雷所處時代環境和個人政治條件的侷限。例如喬治忠認為雷海宗雖然提出質疑「奴隸社會在人類史中普遍存在」的觀點，但未經縝密研究即輕率發言惹禍，不如在廣西從事田野調查、嚴謹考訂史料的黃現璠(1899-1982)奠定「無奴」學派之貢獻。⁹¹然而，黃現璠詳盡闡述此「無奴」論點的代表專著《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是改革開放後的1981年才出版，終毛澤東時代亦難以公開談論此論點。更別提黃現璠曾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政治待遇比雷海宗優渥許多，卻也被劃為右派，文革中慘遭批鬥。倘雷海宗不早逝，或黃現璠在文革時不幸被整死，後續如何還很難說，豈能如此以成敗論英雄？

塑造大師做為旗幟，也同時是塑造學術社群的「記憶所繫之處」，凝聚團體自身的記憶、歷史及認同。南開大學的兩次雷海宗紀念研討會，論文集的眾多紀念文章之中，有真情流露的憶師友之作，也有馮承柏、呂萬和等人

⁸⁹ 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頁101。

⁹⁰ 喬治忠，〈雷海宗學術評價問題新議〉，《學術研究》，第1期(廣州，2014.01)，頁93-104。

⁹¹ 喬治忠，〈雷海宗學術評價問題新議〉，頁102。

對反右運動過程的紀實反思，做為替受難者平反的見證。但誠如喬治忠指出，說堂皇場面話的應酬之作也不少。無論是門生故舊的回憶，還是領導嘉賓應邀的發言，溢美之詞難免，不乏諸如「一代史學宗師」甚至「偉大的預言者」之類浮誇的稱號。⁹²對雷海宗的諸多讚頌中，除了著墨其在教學、研究本職上的熱忱，近來也益發強調其「愛國」的一面。例如描述雷「出於對祖國的熱愛……毅然決定留在北平清華園，迎接解放」，⁹³或是舉其在抗戰時謝絕洛克菲勒基金會邀請赴美國講學的史料，強調雷先生「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不肯離開故土」的「愛國思想、犧牲精神」。⁹⁴雷海宗褪下毛澤東時代反動右派的外衣，在 21 世紀初蛻變成學貫古今中西的史學宗師及「愛國民主人士」，猶可一窺中國近現代政治變化下，歷史書寫因應當時需求重建記憶或賦予新的意義之現象。

六、結語：一個對比

本文爬梳雷海宗的相關資料，探討這位民國時期史學界重要的知識分子在其人生轉折點的行動與遭遇，並分析其身後名譽的恢復及大師地位的塑造。從反右至文革期間，雷海宗是被官方論述排斥且亟需被遺忘的對象。改革開放後，主要藉由其弟子王敦書與南開大學歷史系(歷史學院)的推動，重建其學術地位，獲追認為南開史學奠基人之一。

做為同樣在民國時期史學界引領風騷的名人，雷海宗在許多方面都值得與傅斯年對照比較。王汎森認為傅斯年最大的成就，是在其學術生涯中組織和領導數個學術群體——包括一手創建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還有曾掌理校務的北京大學與臺灣大學。傅斯年秉持現代學術研究非以群體努力不足以取得成效的信念，藉由領導上述機構，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制度的主要

⁹² 「偉大的預言者」是《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對雷海宗相關紀念文章合輯的總標題。

⁹³ 王敦書，〈《西洋文化史綱要》導讀〉，收入雷海宗著，王敦書整理、導讀，《西洋文化史綱要》，導讀頁3。

⁹⁴ 劉桂生，〈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中有關雷海宗先生的史料三則——紀念先生110週年誕辰〉，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第四屆世界古代史論文集》，頁22。

建構者之一，特別是達成歷史學的專業化。王汎森嘗試將傅斯年的個案帶入「在中國建立一個學術社會進程中的成功與挫折」的宏觀主題來探討。然而，從一位五四青年到堅決反共、與國民政府關係密切的「學閥」，傅斯年的生涯也是出了名的同政治糾葛不清。由於傅斯年晚年多從事行政與政治事務，無法發表嚴肅的學術著作，王汎森認為這段經歷揭示「政治如何實際主宰並最終耗盡了他〔傅斯年〕的生命」。⁹⁵

雷海宗和傅斯年相似，都曾領導過學術群體，親近國民政府(甚至雷還加入國民黨)，對時事政治也保持高度關注。就像傅斯年藉由史語所發展歷史考證學派的方法，雷海宗也藉由報刊時論、《戰國策》雜誌及《戰國》副刊等媒體宣揚其文化形態史學。但是兩人的史學理念相差極大，甚至對立。傅斯年反對通史，將個別事實的考據放在理論之上，拒絕史學與道德倫理或現實政治的指導產生關聯。反之，雷海宗是所謂的史觀學派，喜談通史或宏大題目，重視哲學綜合甚於零碎事實的堆積，也好將史學與現實國際情勢及國家戰略連結。

兩人學術思想與晚年際遇的命運也極其不同。在中國大陸政權更迭時，傅斯年退居臺灣，雖然早逝，其學術思想藉由中研院史語所和臺大傳承並發揚，兩所機構皆執臺灣學術界之牛耳，因此其學派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臺灣的中國史學界「正統」，影響持續至今。雷海宗留在大陸，卻由於其政治背景及言論遭整肅，不得安寧。他的學術著作和聲譽雖然在身後有弟子幫忙重建恢復，但生前所提倡旨在比較中外文明、宏大疏闊的文化形態史觀，在毛澤東時代不正確，在史料考據方法已成專業史學研究主流的今日學術界，也已少有什麼實質學術影響力。⁹⁶可以說，他的思想隨著「解放」後失去自由以及晚年捲入反右運動，同他一起被埋葬了。這段經歷也顯示政治如何實際主宰並最終耗盡了雷海宗的生命。

⁹⁵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頁9-12。

⁹⁶ 雷海宗的史學，借鏡史賓格勒甚多，也與其同時代的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類似，這類重文化概念、文明比較等宏大形而上題旨的研究路徑，應放在同一系譜考量，且1960年代以後在專業史學界勢力亦衰微。參見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一九五〇~二〇〇〇〉，《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4期(臺北，2001.11)，頁10；陳惠芬，〈文化形態史觀與國史研究：論雷海宗的史學〉，頁276-279。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史料

1. 檔案

〈安排雷海宗進南開大學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表格〉，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雷海宗小傳(材料來源文委會)〉，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簡歷與政治態度〉，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蔣中正電傳作義」，〈武裝叛國(一七四)〉，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300-00197-213。

中共天津市委整風辦公室製，〈右派分子情況登記表〉，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中共南開大學委員會，〈中共南開大學委員會關於對右派分子雷海宗的摘帽問題的報告〉，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王學珍、郭建榮主編，《北京大學史料：1946-1948》，第4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雷海宗，〈公開檢討〉，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雷海宗，〈思想反省小結〉，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雷海宗，〈個人思想自傳〉，南開大學藏，《南開大學雷海宗檔案》，無檔號。

2. 回憶錄與文集

- 〈毛澤東書信中關於吳景超的內容摘錄〉，收入呂文浩、嚴飛、周忱主編，《把中國問題放在心中：吳景超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22。
- 王成彬，〈鄭天挺雕像落成小記〉，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 王敦書筆述，王堅整理，〈師恩重於山——雷海宗的最後十年〉，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
- 江沛編，《雷海宗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
- 何炳棣，〈雷海宗先師專憶〉，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吳廷璆，〈駁斥雷海宗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謬論〉，收入科學出版社編，《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 吳景超，〈我與胡適——從朋友到敵人〉，收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胡適思想批判》，第3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
- 吳景超，〈批判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收入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梁漱溟思想批判》，第1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
- 吳景超，〈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收入吳景超、楊人楩、雷海宗等著，《光明日報》編輯所編，《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報社，1951。
-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 呂萬和，〈百家爭鳴中的我與雷海宗——兼談「唯心」、「唯物」及「批判」〉，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

- 尚黎，〈最後的一課——記聲如洪鐘的雷海宗先生〉，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科學出版社編，《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 科學出版社編輯部，〈前言〉，收入科學出版社編，《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 孫定國，〈揭穿雷海宗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惡毒手法〉，收入科學出版社編，《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3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 孫定國，《雷海宗批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 馬瑞潔、江沛，〈雷海宗年譜簡編〉，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
- 張景茆，〈我的回憶〉，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張象，〈憶雷海宗先生與世界現代史學科〉，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許亞芬，〈紀念雷海宗師〉，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陳振江，〈深情憶雷師〉，《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辜燮高，〈雷海宗先生南開教學軼事〉，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
- 馮承柏，〈史學大師雷海宗先生 1957 年蒙難始末〉，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76-83。
- 馮爾康，〈重溫與新習伯倫師的學術宏論〉，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雷海宗，〈中國的兵〉，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
- 雷海宗，〈社會科學工作者與新的社會科學——參觀土地改革中的一個體驗〉，收入吳景超、楊人楩、雷海宗等著，《光明日報》編輯所編，《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報社，1951。
- 雷海宗，〈歷史警覺性的時限〉，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
- 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收入江沛編，《雷海宗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
- 雷海宗著，王敦書整理，《世界上古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12。
- 雷海宗著，王敦書整理導讀，《西洋文化史綱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趙儷生，《籬槿堂自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劉桂生，〈洛克菲勒基金會檔案中有關雷海宗先生的史料三則——紀念先生 110 週年誕辰〉，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
-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2014。
- 蔣孟引，〈雷海宗先生給我的教益〉，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編，《雷海宗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雷海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鄭克晟，《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北京：中華書局，2023。

鄭嗣仁，〈鄭天挺教授大事記〉，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魏宏運，〈憶雷海宗先生在南開的歲月〉，收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編，《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國第四屆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6。

魏宏運，《魏宏運自訂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3. 報刊

雷海宗，〈近代史上的羅馬教——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之二〉，《歷史教學》，第9期(天津，1951.09)，頁75-78。

雷海宗，〈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歷史教學》，第7期(天津，1957.07)，頁41-47。

〈本刊啟事(代發刊詞)〉，《戰國策》，第2期(昆明，1940年4月15日)，頁1。

〈發刊詞〉，《周論》，創刊號(北平，1948年1月16日)，頁1。

雷海宗，〈參加土改總結與一年學習總結〉，《光明日報》(北京)，1950年3月29日、3月30日，2版。

雷海宗，〈社會科學工作者與新的社會科學——參觀土地改革中的一個體驗〉，《光明日報》(北京)，1951年4月4日、4月5日，2版。

雷海宗，〈從歷史事實看天主教〉，《光明日報》(北京)，1951年4月17日，3版。

雷海宗，〈參觀西北土地改革中額外的一大收穫——西安市人民生產教養院參觀後感〉，《光明日報》(北京)，1951年6月2日、6月3日，2版。

雷海宗，〈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一)——今日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簡介〉，《歷史教學》，1951年第8期(天津，1951.08)，頁49-51。

〈南大學生擊退右派反動言論〉，《天津日報》(天津)，1957年6月28日，版次不詳。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北京)，1981年7月1日，1版。

(二)近人論著

1. 近人專書

Bowler, Peter. *Evolution: The History of An Ide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Fan, Xin. *World Histor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hina: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Farrenkopf, John. *Prophet of Decline: Spengler on World History and Politic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20。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裴毅然，《這是為什麼？：「右」難及成因》，臺北：獨立作家，2022。

錢理群，《拒絕遺忘：「一九五七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2. 近人論文

Nora, Pierre.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Rethinking France: Les Lieux de Mémoire, Volume 1: The State*, edited by Pierre Nora and David Jordan,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lbrook, vii-xxi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Rigney, Ann. "Introduction: Values, Responsibilities, History." In *Historians and Social Values*, edited by Joep Leerssen and Ann Rigney, 7-15.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 江沛，〈戰國策學派文化形態學理論述評——以雷海宗林同濟思想為主的分析〉，《南開學報》，第4期(天津，2006.07)，頁37-43。
- 李福鐘，〈關於「反右」起因的若干疑點與商榷——1956至1958年中共政局再思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7期(臺北，2007.05)，頁43-98。
- 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一九五〇~二〇〇〇〉，《漢學研究通訊》，第20卷第4期(臺北，2001.11)，頁6-17。
- 施純純，〈戰爭與民主：抗戰時期中共的民主論述及戰國策派的挑戰〉，《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2卷第3期(臺北，2020.09)，頁411-449。
- 范珮芝，〈抗戰時期的救亡思想：戰國策派的文化改造主張〉，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陳惠芬，〈文化形態史觀與國史研究：論雷海宗的史學〉，《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16期(臺北，1988.06)，頁255-284。
- 喬治忠，〈雷海宗學術評價問題新議〉，《學術研究》，第1期(廣州，2014.01)，頁93-104。
- 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臺北，2010.03)，頁17-58。
- 戴麗娟，〈譯者導言〉，收入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人出版社，2012。

3. 報紙

- 楊芳，〈吳景超：被浪費的才情〉，《中國青年報》(北京)，2008年5月7日，版次不詳。

4. 網路資料

- 中國知網，<https://cnki.net>，檢索日期：2022年10月30日。

謝志浩，〈雷海宗：清華史學的「失蹤者」〉，<https://www.tsinghua.org.cn/info/1952/16650.htm>，檢索日期：2022年10月30日。

附圖



附圖：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大廳的雷海宗雕像，右為鄭天挺雕像。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From Reactionary Rightist to the Grandmaster of World
History: The Ups and Downs of Lei Haizong during and
beyond His Lifetime**

Huang, Hsiang-fu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he exodus of intellectual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fate after 1949 has been an enduring topic for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However, among the scholars who stayed in mainland China, Lei Haizong has also been an important figure in academic history since the 1930s. He served as the head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s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was a notable early proponent of historical morphology of culture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Because of Lei's previous membership in the Kuomintang and his criticism of commun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was subjected to strict political monitoring and ideological re-education. Lei transferred to Nankai University in 1952 but was classified as a rightist during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in 1957. This severely compromised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career until his death. After Lei's rightist status was expunged in 1979, his former student Wang Dunshu edited and republished his works, which contributed to a "renaissance" of research on his life; he is now celebrated as the disciplinary founder of world history at Nankai University. The rise, fall, and revival of Lei Haizong's academic reputation and status during and after his lifetime epitomize

the whirlwind of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The story of Lei's life and career also reflects how history is written in different contexts and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s. The story also demonstrates how the efforts of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can shape i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strengthen its own historical identity. By using the records that have survived, including memoirs written by Lei's family,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political documents, and the archives held by Nanka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critical moments of Lei's life, especially his encounters with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and the posthumous recovery of his academic reputation and status.

Keywords: Lei Haizong, Nankai University, Anti-Rightist Campaign, history writing, collective memory

